

明清之際西洋文化輸入中國的文學場景

評《百年輝煌》系列作品中天主教徒形象

陳占山*

明清之際西洋文化的輸入中國，很早就成為學術界討論和研究的重要話題，但將其歷史人物原型作為文學創作再現的對象，較充份地寫進形象思維的作品之中，則自中國新文學發生以來實屬罕見。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才出現較為成功之作，那就是凌力的《百年輝煌》系列小說前三部。本文主要對小說中有關話語進行解讀，意在揭示凌力小說在同類作品中的獨特性，指出明清之際天主教人物已進入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視野的現象，理應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在取材於明末清初的中國當代歷史小說中，凌力《百年輝煌》系列前三部有一引人注目的特點：即把此時期西洋文化的輸入者及輸入成果納入視野之中，寫進自己精心構築的作品裡。以西洋文化對當時歷史影響的深度和廣度而言，此乃理所當然之舉。

本文試圖通過對小說中與西洋文化有關話語進行解讀，試以揭示凌力小說在當代作品中的獨特性，旨在指出明清之際天主教人物到 20 世紀末葉才進入當代中國文學作品視野的現象。目前學術界正在討論藝術作品應如何表現歷史人物⁽¹⁾，筆者希望通過本文，對這方面的討論作點回應。

作品中的西洋文化話語

所謂“西洋文化”，明清之際一般通稱為“西學”，天主教人士則稱“天學”，其大體包括天主教和歐洲的科學技術。它們是萬曆中期以後由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傳教士履危蹈險，飽嚙千辛萬苦陸續帶入中國的。稍有不同者是西洋火器及鑄造、點放技術則部分地來自於 16 - 17 世紀活躍於中國東南

沿海的西方殖民勢力。

西洋文化在晚明以來向中國的輸入和在中國的傳播，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標誌着中國由亞洲的中國向世界的中國邁開了第一步，其對明清社會的巨大影響，既有學術思想層面的，也有技術應用層面的，又有社會風俗方面的。而可視為上述諸影響的一種綜合成果，即為在中國社會中產生了一批天主教徒。獨特的西洋文化的滋潤和天主教倫理的沾溉，使他們具備了一些一般中國大眾所沒有的品格。特別是其中的士大夫教徒，除了宗教的皈依，他們大都熱衷並熟練掌握某種或某些輸入的西方科技，這就使得這些信徒成為當時中國社會上一批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再加上西洋文化輸入者——來華傳教士中的部分人物，在天裂地陷般巨變的明清政權交替時期，風雲際會地走到了歷史的前臺，扮演了相當特殊的歷史角色。

文學藝術是通過生動、具體的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的，以探究明亡清興根由為宗旨的《百年輝煌》系列小說，當然也不能例外，其獨特之處即在所表現和塑造的數以百計的人物中，有一些其它同類作

* 陳占山，歷史學博士，汕頭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

品中欠缺或甚罕見的人物，他們正是前述之天主教徒。這些教徒是當時漢、滿、洋三種文化中，西洋文化或兼負中西兩種文化的載體。綜觀作品所及，按照各人身份，對於他們可作如下劃分：

一是西洋文化的輸入者：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陸若漢等；西洋火器專家可萊亞等。

二是士大夫教徒：孫元化，徐光啟，王徵，張燾，金聲，瞿式耜，李祖白等。

三是士大夫教徒的家屬：徐光啟夫人，孫元化夫人，孫元化女兒幼蘩，使女幼蘅，子和鼎，和斗，和京等。

由於各人擔當角色不同，作者所花筆墨也有多有少。但有一點，即凌力在其作品中對西洋文化的揭示和張揚，正是通過對上述天主教徒形象的塑造和描寫得以實現的。這個可留待下文專論，此處有必要對作品所涉及的與西洋文化有關的重要話題，稍加瀏覽。

這還得先從晚明社會接納西洋文化的原因說起，概而言之，主要有兩點：

一是曆法的修訂。在中國古代，曆法的編訂頒行是國家大典，箇中極富政治、宗教內涵，因不關本文論旨，故不贅述，祇須指出由於堅守天人合一的信念，中國曆法功能之一天象吉凶預報，是王朝重大決策的基本依據，而預報的準確與否，則與曆法中給予的日、月、五星乃至二十八宿運行狀態的助算表格的精確度直接相關。可是，自明代以後，中國人已喪失了編訂一部準確曆法的能力了。這一尷尬局面被萬曆間來華的利瑪竇敏銳地察覺到，他即於此後不斷函告西方傳教士派出機構，請求選派對此有卓絕素養的教士來華。利氏的呼籲，自然得到有關方面重視。而經過一番周折，中國政府終於接納其人，從事這一工作。

另一原因是任用傳教士傳授西洋火器的鑄造、點放技術。明正德、嘉靖以後，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在中國東南沿海耀武揚威，西洋先進的火器漸為國人中的有識之士賞識，他們希望將此先進武器移植、裝備到明軍隊中，以求在同後金的軍事較量中多一分勝算。這樣，主要在奉教士人的努力下，博

學多能的傳教士便又扮演起明政權實現上述目標的技術指導，而成為其在華立足的第二個理由。

可是，作為傳教士，他們又時刻不忘傳教使命，這就使得他們具有了雙重身份：既是宗教使者，又是明廷及取明而代之的清政權的技術臣僚。隨着上述角色的展開，使中西文化的交會和衝突，成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社會人文景觀。

凌力在她的小說中，慧眼獨具地剪裁了其中一些畫面，主要是教士的博學多才及執着於宗教使命；西洋火器的應用，促成天啟六年“甯遠大捷”；崇禎四、五年“吳橋兵變”，登州陷落，西洋火器由明軍轉手清軍，明王朝由“傾城”而“傾國”；順治皇帝福臨寵信西洋教士；康熙時代的第一個十年，歐洲天算成為改革派和保守派矛盾衝突的焦點等。而上述話語的展開，主要是通過對湯若望、孫元化及其他一些中國教徒活動的敘述和形象塑造得以成功付諸實現的。

入華教士的傑出代表湯若望

歷史上的湯若望，原名約翰·亞當·沙爾·馮·貝爾（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5月1日出生於德意志萊茵州科隆城一信仰天主教的貴族家庭。他少年時期在家鄉完成中學學業，1608年（也即17歲之後）遠赴羅馬，入教會學校讀書，後加入耶穌會，並於1616年獲准前往中國傳教。1619年7月到達澳門，先是在那裡學習漢語和精研中國文化三年，後進入內地傳教。由於他博學多能，特別是作為范禮安和利瑪竇等“適應性傳教策略”的堅決維護者和實踐者，所以成為繼利瑪竇之後赴華耶穌會傳教士的傑出代表。湯若望在華所為，不止傳教，還出色地參與了當時中國的大量科學活動，且有驕人的成績。^{〔2〕}同時，他與中國官方有密切的交往，是當時眾多入華教士中唯一同明清兩朝最高統治者有過間接或直接接觸、並於清初首先成為新王朝正式官員的教士。康熙元年，在主持中國官方最高天文機構十八年之後，湯若望被任命為光祿大夫，獲賜一品頂帶，着繡鶴補服，成為歷史上在中國任京官階銜最高的歐洲人之一，並成為極少

數曾獲封贈三代及恩蔭殊遇的遠臣。在《百年輝煌》中，他是貫穿三部作品的唯一外國人。作者較成功地再現了這位傑出人物的豐采。首先是虔誠、執着的傳教士形象。傳播天主教可以說是明清之際傳教士來華的唯一目的。在華長達半個世紀的湯若望，始終不忘自己的使命，並為之付出不懈的熱忱和努力，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這一點。

《傾國傾城》中有這樣一個片段，湯若望受明廷派遣押送紅夷炮到登州，長途跋涉，十分辛苦，可聽說有十數名奴婢僕人願奉天主教請他施洗時，便立即行動起來。待此事了結，“身心俱疲”，“若再不立即上床休息，眼看就要站不住了”，但當教徒提出要告解時，他一刻也不肯耽擱，“如注入了神藥一般，垂下的雙肩挺起來，重新顯得神采奕奕，熱情蓬勃，疲倦憔悴彷彿被一陣風吹走。”⁽³⁾《少年天子》中，北京教堂一僕人是這樣描述他眼中的湯若望的：“對教徒大眾佈道講經，這個時候，誰都不見。……對窮人、對病人和孩子，他那心腸軟得像水；可是誰要礙了他的傳教大事，那就像乾柴烈火，一碰就着，可兇哩！”⁽⁴⁾作者還講述了這樣一則動人的故事：孫元化被朝廷下獄論死，臨刑前一晚，湯氏不顧有關禁令，化裝為一煤販前去慰問。此事原有所本，可見德人魏特《湯若望傳》。而在小說中，僅化裝這樣一個細節，就真切地體現着湯氏對教徒的一片愛心：“孫元化記憶中的湯若望，永遠是學者風度與貴族氣質的合成，每天必須洗浴換衣的潔癖連孫元化都感到驚異，所以每靠近他，就令人想到純淨的清泉，似能嗅到冰雪的氣息。而眼前的湯若望，不僅剃掉了濃密鬚曲的大鬍子，剪去了金黃色的長鬚髮，還穿上了這肮髒的行頭，弄得滿臉滿身烏黑……”⁽⁵⁾由於全身心都裝着教徒，所以贏得了教徒的無比熱愛和崇敬，在教徒眼裡，湯氏就是上帝的化身。

從利瑪竇進入中國始，耶穌會傳教士就為爭取中國皇帝入教努力着。這是因為祇要皇帝皈依了天主，就可一勞永逸地皈依全部中國人。湯若望對實現這一目的也不遺餘力。《少年天子》讓湯氏第一次出場，就向前來教堂遊觀的福臨進言道：“君主帝

王應該奉祀上帝，崇敬上帝。尤其是您，皇上。”他的理由是福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帝王，又自命天子，且統治着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由此也勞天主特別眷顧。可是，皇帝的尊嚴，俗世無限的享受，福臨如何能放棄？而在小說中，作者還是把湯若望對此事的固執，延續到了福臨生命的終點。他堅持要內監替他帶給皇上一本畫冊，並替他轉奏皇上：“陛下靈魂的永久福樂，現在已到了很危急的地步，我不能不為此着急。請陛下至少把這文本閱讀一遍，這是人類死後的情景和天國的永生啊！”⁽⁶⁾這樣的描述雖不見有史料根據，但卻完全符合湯氏性格。對於他的這種執着，福臨曾極為稱贊：“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涓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朕甚嘉之。”⁽⁷⁾

二是嚴正的帝師形象。主要描述清最高統治者對湯氏的恩寵及後者對“少年天子”的影響。入清後，湯若望贏得孝莊和順治帝的極度寵信，起因看似簡單：湯氏在不知不覺中，為孝莊的侄女（她是福臨的第一位皇后）治好了重感冒，因而被認為有恩於皇家，而被孝莊和順治尊為“瑪法”。然而，實則當另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加以利用。一則滿人崛起於東北邊陲，文化心理上有了無漢人的虛驕情態，而湯氏的確才學高深，可堪重用；二則，也是最重要的，即籠絡中國各地的天主教徒，包括天主教勢力滲透、浸染極深的南明永歷朝廷。湯若望作為深受福臨崇敬和厚愛的“瑪法”，他對朝中政事之得失、少年天子之言行，總是每有所見必陳，言無不盡。《少年天子》中描述順治十年前後，福臨對他的治國方針有次重大調整。原來滿清入關後，一直崇尚武力殺伐。然而鐵蹄和刀劍終究壓不服反抗者的怒潮，且有使全國政局惡化之勢：順治九年，桂林失陷，定南王孔有德敗亡；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奉命征討湘黔，竟全軍覆沒。經過慘痛失敗的打擊和痛苦思索，福臨終於接受湯若望等人的政見，推行仁慈溫和的政策，對各地反清勢力包括鄭成功、南明永歷等實行招撫，結果成效顯著。

順治九年（1652）達賴進京覲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西藏方面主要是想借助於中央政府

提高喇嘛教的聲望及向內地滲透，其中還有想把皇帝變成喇嘛教的弟子這樣一個最重要的意圖；而清廷一方則試圖藉達賴的聲望，安定地方，特別是解決統一信仰喇嘛教的蒙古喀爾喀各部的問題，並使其効忠於清廷。此事一開始就起紛爭，如在福臨是否適宜前往邊地迎接一事上，朝中滿、漢大臣各持一端，爭執不下。大概說來，滿臣主去，而湯若望和漢臣則堅決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尊嚴，主張不去。作者在作品中描述了湯若望的作為：“湯若望不僅上了一封很長的諫書，還親自面奏皇帝，認為皇帝不可自失尊嚴招致這種恥辱。”結果湯若望的諫正和漢臣的反對發生效力，皇帝最終放棄他原來的打算，致使進京的達賴代表團最重要的心願完全落空。⁽⁸⁾湯若望的舉動肯定有為其鍾愛的君主着想的一面，但最重要的應是為天主教在華利益阻止喇嘛教勢力在朝廷和內地的擴張。

阻撓荷蘭代表團的貿易要求，是作者塑造湯若望“帝師”形象的重要一筆。史載：順治十年六月，荷蘭國王派遣一個由十七人組成的代表團到北京，“齎表朝貢，並請貢道”⁽⁹⁾，荷蘭人在所呈國書中還提出“凡可泊船處，准我人民在此貿易，一者是天主所定，一者各國規矩皆然，且令中國人民，兼得利益”。⁽¹⁰⁾小說的作者選擇此事，刻劃湯若望豐富的內心世界以及“既顧念私交，又不礙大局”的形象。他特向皇帝請求並獲准給予來自自己故鄉的荷蘭使團以最高禮遇。他自己也竭盡地主之誼，是謂“顧念私交”。可湯氏又體念着他所為之服務的國家和君主的利益，從“大局”出發，此後他真誠地上奏摺，或當面提醒福臨：荷蘭提出的通商要求不過是藉口，“通商的背後來意不善”！因為荷蘭窮兵黷武，稱霸海上，垂涎中華。門戶既開，想關可就不容易了！他向福臨進言：可利用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三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矛盾，收相互牽制之效。最後還直言不諱：耶穌會士與荷蘭人有宗教信仰上的不同，讓加爾文教派進入中國，耶穌會無法容忍。這樣的描寫顯得十分真實。或由於湯氏的阻攔，荷蘭使團最終祇得到“八年進貢一次，可附帶小宗貿易”的許可而已。

在關乎國家大政方針上進言，除上述情節外，作品還描述了湯若望諫止福臨於順治十五年欲親征鄭成功之舉。而順治在所選繼承人的重大問題上，也曾聽取湯氏的意見。

湯若望的帝師形象還表現在他對福臨個人品德和帝王素質的諫正上。他隨時規勸皇帝須遵守帝王的責任和義務，厚愛百姓和官吏，時刻牢記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教誨等等。這也包括對皇帝失德行為毫不容情的批評，如對福臨亂倫縱慾的批評，對滿人劫掠惡習的譴責等。

博學多能的學者形象。湯若望是天主教神學家，小說又展示了他精通天文曆法，諳熟各種器械製造，並掌握中西多國文字的學識和才能。

總之，作者筆下的湯若望是一個極富亮色的人物，是歐洲科學文化的代表。而這樣一位人物，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後，已深深地愛上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人民。康熙初，因楊光先和仇教的四大輔臣羅織罪名，湯若望和他的同事們身陷大獄，倍受凌辱折磨，可就在這種境況下，當聽到南懷仁在詛咒：“這個野蠻的、迷信的國度！這些不辨是非的沒有心肝的人們！上帝啊，您為甚麼不降罪他們？為甚麼不懲罰這可詛咒的地方？”湯若望就立刻堅決地打斷同伴的抱怨，指說南懷仁完全搞錯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一個偉大的民族，足以同歐洲古老的羅馬帝國相媲美。它的文化之博大精深，它的倫理道德之完整牢固，是難以想象的。”一針見血地指出南懷仁由於來中國時間太短，接觸的人太少，所看到那些邪惡殘酷的人，“偏偏又不是這個民族的代表和精華”。⁽¹¹⁾淵博的學識，高尚的情懷，使這位傳教士脫盡了塵世俗見，心靈高度地淨化了。作者對湯若望的評價基於對其人格認同的極致，為此湯氏在臨死前對東西文化的缺陷有了某種極為超前的感悟和認知。湯若望在向南懷仁轉述自己有關布魯諾的夢境後，說了這樣一段話：“如果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布魯諾的宇宙無限論是對的，那麼我們不也是在扮演楊光先之流愚昧殘酷的可悲角色嗎？”⁽¹²⁾至此作者才最終完成了他心中近乎完美的湯若望形象的塑造。

奉教士人的楷模孫元化及其他中國教徒

歷史人物孫元化(1581 - 1632)，字初陽，號火東，江蘇嘉定人，舉人出身，是晚著名學者徐光啟的入室弟子，天主教徒。其人極富學術造詣，除協助徐氏刪訂《勾股義》外，在西方文化影響下，還撰有多種兵學著作和數學著作，應是奉教士大夫在晚明軍中歷官最高的一位，也是當時軍中以西洋火器裝備為改革內容的積極推行者。⁽¹³⁾

其仕歷可以崇禎三年五月為界，分為前後兩段。此前孫氏意氣風發，卓有建樹。主要交替任職於兵部或遼東抗金前線。他是晚明著名將領孫承宗、袁崇煥的部下，曾被後者譽為“識慧兩精”，善於用西洋火器打擊強敵，是朝野公認的“邊材”，屢因軍功受獎。崇禎三年，明東江署前協事劉興治兵叛，朝中議設登萊巡撫，元化受薦舉出任此職，駐守登州。除巡撫登、萊、東江外，他還兼負恢復被金兵佔領地處遼東的金、復、海、蓋四州之責。元化接任後平劉興治亂，並有效防禦金兵對皮島的侵襲，取“麻線館之捷”(小說中稱“皮島海戰”)，並練兵治器，積極準備收復失地。但晚明的登州，是各種矛盾的集結點：遼兵和登州兵不和；駐兵和地方勢力不睦；軍官之間矛盾重重，驕兵悍將不受節制；加之軍餉嚴重缺欠。孫氏接任以來，雖竭力化解各種矛盾，但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因軍餉拖欠以及軍人同地方勢力矛盾激化等因，終於爆發孔有德的吳橋兵變。事變後孫元化力主安撫，而朝中剿、撫兩派爭論不休，致延誤時機，登州陷，元化被俘。五年二月元化終於被叛將釋放，卻被朝廷逮治下獄，遭受嚴刑，慘於同年七月，與其助手登州副將張燾同棄市。

在小說中，孫元化是《傾國傾城》的主角。作品主要寫他出任巡撫後的生活，特別是寫吳橋兵變前後以及就逮回京受審到慘遭殺害前孫氏的悲劇人生道路。作者出色地塑造了一位忠貞體國、才幹優異、清正廉潔、為明社稷嘔心瀝血辛勤工作的封疆大吏，同時又處處受到無端猜忌掣肘、不僅未能充

份施展雄才大略而最終功敗垂成走向毀滅的封建社會的“節士”形象。小說中孫元化的形象塑造，基本上脫胎於史籍記載，下面擬選取主要由作者大膽想象合理虛構，又為孫元化完滿藝術形象不可缺少的若干方面略作剖析。

時人嘉許的正人君子。歷史人物孫元化是被“亡國之君”的崇禎誅殺的“罪臣”。“罪臣”之說當然難成定論，凌力尊重歷史事實，反其道而行之，將其塑造為功臣、節士。要使這種形象能站得住，則仔細鉤稽連綴當時社會上各色人等於不同境況下對孫氏的評論以突現其公論形象就相當重要。作者正是這樣苦心經營的，確實較平實地為讀者展示了各種人眼中的孫元化，諸如皇帝、權臣、宦官、同僚、平頭百姓、敵方君臣等等，皆有“表態”，甚而寫出同一人不同時期的看法。前一種情形，多為稱賞之語，此可舉皇太極的主要謀士、後被譽為大清開國文臣之首的范文程的說法：“此人是目下大明朝中，少有的實心謀國之臣。”“文武全才，天文、數術、火器、炮臺乃至水利農事無不精通，是當世奇才。”⁽¹⁴⁾當然也有極貶者，不過，他們恰恰是從其非進士出身以及喜用所謂的“夷器”着眼的，如山東右參政兵備道徐從治就說：“不過是挾夷術而自重，獻淫巧而邀寵罷了！我很看不上這路人物！”⁽¹⁵⁾後一種情況如對呂烈的刻劃，此人公開的身份是登州陸師游擊營營官——“登州駐軍最標致、最有才幹、最放蕩不羈、最難捉摸的年輕都司”，實則是皇帝和朝廷暗中安插在登、萊前線監視群僚的特務——錦衣衛指揮使。作者未襲前人老套將這類人一概罵倒，而是將其塑造為“大事上不糊塗”、嫉惡如仇的正人君子。他自命看破紅塵，以為天下根本沒有清官賢臣，所以對於口碑頗佳的新任巡撫，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充滿敵意和不信任，甚至惡意挑釁，“就盼着他變臉，戳穿假面具”，卻每次都“輸給了對方”：“一旦與孫元化在一起，就不由自主地受他吸引，為他的風度學識所傾倒，那些捉弄人的花招就使不出來，甚至刻意對他嘲諷譏刺之後，心裡還老大不過意，彷彿做了錯事。”⁽¹⁶⁾呂烈這種“故態復萌”經歷多次反覆，直到最後“真心誠

服”，終於認可孫氏是位少有的正人君子。

虔誠的教徒。“歷數天下兩京十三省的總督、巡撫府第，唯有登萊巡撫府中有一間祈禱室。”⁽¹⁷⁾那麼，這位有明封建王朝末期的中國士人是如何認識天主教的？天主教倫理對他的工作作風及日常生活、乃至於整個人生道路起了甚麼作用或發生了甚麼影響？有關史籍罕載，而小說作者則給予關注。同當時大多數士大夫教徒一樣，孫氏皈依天主教的動機除尋求儒學中所缺欠的臨終關懷（這一點作者未作表述）外，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於“大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天主教，來淨化社會風氣，挽救國家的衰敗。在小說的敘事情節裡，孫元化為之慷慨陳辭：他痛斥佛、道、儒三教為無用之學；佛門道教講的是出世，講的是清淨無為，而大丈夫理當建功立業，報効國家；儒門雖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自孔老夫子至今，千餘年下來，卻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朝野上下都自稱忠良自以為賢能，其實多是蠅營狗苟之輩，唯利是趨；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由此，孫氏認為，“要挽回國家頹勢，挽回世道人心，唯天主教耳！”⁽¹⁸⁾天主教對孫氏的影響，首先是天主教的博愛、平等思想，使其與人為善，馭下平等，即使對那些“亂臣賊子”，他也總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這應是他能較有效地緩和乃至化解登州各種人事矛盾的一個秘訣。

最能表現孫氏天主教徒本色的，應是他追求聖潔的婚姻及家庭生活。他與沈氏結婚三十年，沈氏為他生下三男二女。因產幼女時，沈氏已年過四十，傷了元氣受了內傷，“夫婦居室之私其實已不能應付”，由此孫氏長時間名義上有妻室，形卻同鰥居，這一點常令沈氏歉疚於心。她時不時勸元化收房以自代，但元化堅守天主教“不二色”之教誡，決不納妾。儘管如此，也難免有堤潰之時，可一旦清醒過來，即痛改前非，決不二過。

作為虔誠的教徒，還表現在危難之時，亦賴信仰支撐。在京師詔獄，元化喝自己的尿以解毒，打碎碗割去腿上的腐肉，用耶穌救難的聖跡鼓勵自己，拋棄了自殺或等死的念頭。

綜上所述，作者筆下的孫元化是明王朝的股肱之

臣，特別是奉教士人的楷模。但作者並未將其寫成“完美無缺”，事實上這樣的人在天地之間並不存在。在孫元化特建的祈禱室裡，當着湯若望神父，他真誠懺悔自己的罪過：“我一生為情所累。少年荒唐，遊學大江南北之際，結了許多露水姻緣，犯了姦淫之罪。……我是否注定此生為情所累至死？情魔時時誘惑，年盡半百，仍不能自己，有許多次險些又破了主的誠律！”⁽¹⁹⁾可是，在中國封建時代“文人無行”或一夫多妻遍行的境況下，孫氏的這番懺悔，也許祇有在奉教士大夫身上才會發生，誰能因此輕看了他們完美？這樣寫來，我們覺得非但絲毫未減損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倒使其形象更為真實感人了。

湯、孫二氏之外，作者對前述其他在華教士和教徒，根據整體的創作需要，或濃妝或淡抹，也無不形神逼肖，給人留下很深印象。如：德高望重、博學多才，又開通隨和的大學士徐光啟；為人忠厚，淡薄名利，可放棄封疆大吏不做而以道義相許、心甘情願地以進士而奉舉人，毅然出任遼海監軍道的王徵；又如一心想做修女，施醫舍藥，救助貧病而不求回報的孫元化女兒幼蘩等等。在作者的筆下，教徒在眾多人物中是充盈着人性光華的一群精英。倘徵之史實，可證作者並非刻意粉飾，當時教徒之品德的確極一時之選，這一點連當時的反教士人也不得不承認，有謂“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眾所仰瞻以為向背者”⁽²⁰⁾云爾。值得強調的是，上所徵引，絕非僅有。晚明人士反教言論集《聖朝破邪集》，可為上說提供堅實的證據。

餘論

在中國現當代歷史小說中，有不少作品的題材、時代背景與《百年輝煌》系列前三部所寫有共通之處的，如羅恆廉創作的帝王系列小說中的《盛世英主·清聖祖康熙》⁽²¹⁾和二月河創作的清代帝王系列中的《康熙大帝·奪宮初政》⁽²²⁾等，但其中很少涉及當時影響已十分廣泛的天主教話語。這裡，不妨選清康熙初年的“天算案”為例。此歷史事件遠非其名稱所限，似祇與天文曆法有關，它實際上是一場政治鬥

爭，影響幾乎波及康熙三、四年到八年間清廷的政策走向、民間社會生活以及清政權對漢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態度等重大問題。其實質應是朝廷中的保守勢力與在野反教士人聯手，旨在通過打擊順治皇帝所信賴的西洋曆法而徹底否定順治以來推行的開明政策，以此將滿清守舊勢力既定的“率祖制復舊章”的統治方針完全付諸實施。種種跡象表明，此案發起時，玄燁尚在沖齡，不可能介入；但康熙七、八年其已執政後，卻十分主動地借楊光先於曆法上的一系列誤差為突破口，向保守勢力的代表龔拜等發起反攻，並由此最終結束“權臣欺主”“壓主”時期，恢復了多爾袞、順治時期的開明統治。湯若望等天主教徒的冤案也由此得以平反昭雪，晚明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良好態勢得以繼續。

對於上述這樣一個重大事件，凌力將其作為《暮鼓晨鐘》的主線，濃墨重彩加以勾勒，而羅著《清聖祖康熙》祇有數百字的描述，且有不少顛三倒四張冠李戴之塗抹，如將玄燁鑽研天算一事放在“天算案”前敘述，聲稱其學習的目的是糾正曆法的偏差滅西洋人之狂傲，同時認為此舉也是康熙在他與龔拜權力鬥爭中所行的韜晦之計，說康熙欲以此“驕怠”龔拜的心態；又稱，康熙傳來輔導自己學習的臣僚中，竟有法國傳教士穆尼閣等等。實則，康熙對西洋天算的學習始於天算案之後，學習的動機康熙自己就有說明：“朕幼時，欽天監漢人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奈九卿中無一人知其曆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²³⁾又，康熙四年前，湯若望主持欽天監，行西洋曆法，當時並無“偏差”問題。至於說穆尼閣為法國人（實為波蘭人），自鑄大錯；其人更在順治十三年卒，如何能被康熙傳來輔導他？而跟着西洋師傅學習西洋學術滅西洋人之狂傲的說法，非但無據，也與情理乖悖。其實，羅書以極短篇幅所涉及的“天算案”文字，其中與史實大相徑庭者遠不止上所指謬。我們不能苟同的是在並不會妨礙作品藝術審美趨向的前提下，作者為何要如此歪曲信史？至於二月河的作品，對“天算案”竟無隻字言及。自然，歷史故事不是歷史故實，即使表現同一

時期的史事，不同的作者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視角和取捨標準，這裡並無意苛求甚麼，祇是想強調，在我們所見同類作品中，凌力的創作確實是較真實而獨到的，即捕捉並反映了時代的特徵——西洋文化輸入並對中國社會發生巨大影響，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化景觀。而由於作者的敏銳洞察和成功再現，遂使現今趕時髦獵奇的讀者有幸得以在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中真正領略與欣賞明清時期入華傳教士和中國天主教徒的豐采。凌力的創作原則也是值得重視的，她說：“我想要寫的是歷史文學，所以我遵循的原則可稱作‘隨心所欲不逾矩’。因為是文學，就必須比真實生活更集中、更精粹，就必須發揮高度的想象力，是為‘隨心所欲’；因為是歷史，就必須有個‘矩’，不能超越史實。不能超越歷史的可能性。”⁽²⁴⁾從這樣的創作理念出發，對照《百年輝煌》系列，可說她已非常出色地實踐了自己的創作原則。藝術作品究竟應如何表現歷史人物，古往今來一直爭論不休。筆者以為凌力的小說，或可為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一個堪稱成功的力作。

【註】

- (1) 如葛紅兵〈反歷史的歷史劇——質疑當前歷史劇熱潮〉，《探索與爭鳴》2003年11月；華強〈如何“還原”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探索與爭鳴》2003年10月。
- (2)(3) 有關情況可參考《清史稿·湯若望傳》；李蘭琴《湯若望傳》，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21。
- (4)(6)(8) 《少年天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頁212-213；頁667；頁168。
- (5)(14)(15)(16)(17)(18)(19) 《傾城傾國》，經濟日報社，陝西旅遊出版社1998。頁599-600；頁483；頁368；頁205；頁219；頁170；頁223。
- (7) 黃伯祿：《正教奉褒》，頁29，上海慈母堂重印本。
- (9) 《清朝文獻通考》。
- (10) 《明清史料》丙編4策頁377。
- (11)(12) 《暮鼓晨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頁309；頁352。
- (13) 學術界對於孫氏的專題研究，可參閱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來的西洋火器〉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1996）。
- (20) 徐昌治：《聖朝破邪集》卷七，頁11493。
- (21) 《盛世英主·清聖祖康熙》，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22) 《康熙大帝·奪宮初政》，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
- (23) 《康熙政要》卷八。
- (24) 〈天子-孫子-孩子——有關《暮鼓晨鐘》創作的思考〉，《當代作家評論》，1994。



吳漁山康熙十一年（1672）四十一歲作品：壽許青嶼山水軸（紙本設色 95.5 x 50.6 cm） 上海博物館藏